

城人物简介

亚当·珀森(Adam Posen)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,现任美国著名智库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、美国国会预算局顾问,兼任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委员、三边委员会委员、哥伦比亚大学日本经济和商务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。

1988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,他一直从事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、G20 国家间关系、金融危机以及中央银行等领域的研究。他撰写的关于美元、欧元以及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分析文章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关注,对各国政府政策和市场亦有广泛影响。

城采访印象

身材敦实,脸上似乎总带着一丝笑意。作为美国著名智库“头脑”的珀森博士,无论是站在台上演讲,还是坐在台下讨论,不经意间总会做出挠头、摸鼻的小动作,一副可爱的“美国大叔”模样。

非典型性经济学家的“卖相”,掩盖不住睿智、犀利的思想光芒。在阐述观点时,他很少兜圈子;提出的论据,也总是比较“接地气”,常常结合着彼得森研究所同仁们最新的研究成果。想必,这也正是其在信息爆炸、众声喧哗间,能够确立“江湖地位”的重要原因。



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·珀森

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

美国智库“头脑”亚当·珀森谈把握“大趋势” 亚洲转型如何寻找新动力?

本报记者 鲁雁南

西方经济增速放缓,长期处于“追赶”之势的亚洲经济在转型之际,又该如何寻找新动力? 面对这样紧迫而又宏大的问题,珀森首先指出,尽管过去亚洲经济出现了一些增长奇迹,但在谈论所谓既有的成功增长模式时,“还是要稍微保留一点灵活性”。因为,过去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,有很多外部条件所决定,这些路径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,存在着增加资本、提升劳动生产效率等方面的问题。

当前最紧要的是地方债问题

在回答“中国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本市场增长,打破发展僵局和瓶颈?”的问题时,珀森则表示:“其实我还是从一个学习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。”但这并不妨碍他直言不讳:“改革的列表上面有许多有待办事项,关键是哪些事项先做,哪些事项后做,中国现在的政策制定者可选方案并不是很多。因为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结果都是双面性的,既有好的,又有不好的地方。”

在珀森看来,当前最紧要的一点“政府已经开始做了,但还需要加速解决”的,就是地方债问题。“在这方面,要确保没有任何其他的备选方案,也没有任何寻租的空间,以及其他任何的可以降低整个改革措施质量的空间”,珀森进而建议,希望未来中国政府能够对那些风险要素进行良好的归管,“如果有一些政府担保,或者说是政府的背书的话,一系列的综合性改革可能会更加顺利地在未来得到推进。”

对于“区域经济一体化”的概念,珀森则强调,这的确是个发展方向,但如果要谈论发展模型和人类福祉的话,需要考虑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“人口迁移”或者说“劳动力市场全球化”,“一些在本国没有得到充分就业的人,跑到其他国家找工作,赚了钱以后再把钱汇回国内,如果积聚到一定水平,也会产生很多问题,在探讨未来成长动力时,这些问题也必须综合考虑进去。”

日本上世纪错误判断大趋势

那么,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,又该如何判断前方的大趋势呢? 珀森说,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系列的问题:在哪个点上短期的问题会变成长期的问题?或者在哪一点上会出现金融危机或者金融上的一些波动? 经济发展的走势,究竟是会出现房地产的繁荣,还是会出现泡沫的破裂?

“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些判断,不可能简单地使用数据或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,来判断未来会发生什么”,珀森以日本的“不断犯错”为例:“(上世纪)80 年代的时候,他们相信‘我们的增长速度太快了’,而没有认识到这种增长的方式可能不是特别具有可持续性;到(上世纪)90 年代又出现了新的问题,日本的银行表现有好几年都不是特别好,而政策制定者却认为这就是新的常态,‘我们对此无能为力’,实际上那个时候真的应该往回退一步看一下大的趋势。”

相信中国不会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说到近来相当热门、许多经济学家就此发表大量论文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问题,珀森首先厘清概念: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是指当人均 GDP 达到一定的水平,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,“例如在日本出现的情况”。但对于“中国会不会落入‘中等收入陷阱’”的议题,珀森却明确表示:“在彼得森研究所,我们确实有些人在研究这个问题,但却得出了和日本完全不同的结论。”

“我的一名同事研究的是成长经济学,他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指向这种所谓的‘中等收入陷阱’,当然如果你到了城镇化已经完成,而不得不推动技术发展时,可能会发现要

取得新的经济成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,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”,珀森说,在这一点上,需要研究的是台湾的例子,因为台湾的经济体也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的紧密联系之上的,对中国内地有参考价值,“当然,中国内地的经济体量比台湾要大得多,因此腾挪的空间也会更多”。

在珀森看来,还有一个坚信中国不会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重要理由是,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农村地区有待发展,这些地方仍然有数亿人口,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还远远没有结束,“制造业会慢慢移到中部、西部,还会继续带动经济的发展。”

技术放缓给世界经济带来系列影响

结构性改革对中国至关重要

“我们正进入到一个技术放缓的时代。”2014 上海论坛上,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·珀森博士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,道出一种有代表性的忧虑。技术的发展是一波一波出现的,重大的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经济发展。“问题在于当下很多处于科技前沿的富有国家,并不是很清楚下一波技术浪潮到底在哪里。”

钱多,未必都是好事。他担心的一个现象是,欧美公司手里持有巨量现金。这是为了预防未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,同时说明很多企业缺少好项目,不愿意再投资,新的投资周期并没有出现。“不像 1997 年,所有人都会说,光纤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领域,可以投入大量的美元,”他感慨,“这种好日子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。”当然世界的技术进步仍然在进行中,比如说 3D 打印、基因科技进展等,都会改变生活。但技术发展放缓的状况,对新兴的亚洲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,带来一系列的影响。

珀森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他的观点。比如说,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,一种是处在科技创新前沿的国家,人均 GDP 可能超过 5 万美元,比如美国;另一类国家可称之为“追赶型国家”,比如中国,有能力移向第一集团,但现在还在不断调整、吸纳并应用各

种多样的技术。那些前沿国家以某个速度发展着,而另一些国家在追赶。他请听众想象一下,如果第一集团国家的发展速度下降了会怎样?——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相对变快,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。

当没有足够的动力让第一集团的国家进一步发展,第一集团国家的创新和技术发展就会放缓下来,而追赶型国家的发展速度则会加快。“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,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护知识产权,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需要创新,保护得太多,就没有创新。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,我们需要一种额外的措施来实现这种整合。”

当然,在整合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起伏。他承认,美国现在对于其经济的控制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,但美国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体。美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减震器,比如说美国可以进行量化

宽松,减少开支等等。整个世界因为美国经济的变化会产生非常大的溢出效应。

珀森博士提出,富有的国家会认识到结构性的改革变得越来越重要。“但我们知道人们不可能总是理性的,即使是理性的人在一起,也会出现一个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。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,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会变得非常困难。我们也知道,在美国、在中国都有既有的利益集团,要推动他们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能否看到更多的结构性改革,尽管结构性改革对于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。”

至于技术进步放缓对全球汇率以及资本流动的影响,他认为人们当然应该在高增长的经济体中获得更多的资产。当新兴国家比如说中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,富裕国家更多的现金会流向那些新兴经济体国家。

创新放缓,使得西方知名大企业的研发、

高端制造正逐步搬到国外去。他提醒说,那些理性的投资方会喜欢这种情况,但是这里面存在利益冲突。当现金流出富裕国家,进入中国、印度等新兴经济体,同时会带来知识、专长、技术等转移。这未必是富裕国家情愿的,在对外投资方面,不一定会像过去那么友好。

他看好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。理由是,过去的 40 年,在没有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,巴西、印度、东欧等国家的大量人口,从原来的贫困阶层进入了中产阶层。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,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。他建议作为投资者的每个人,要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几年世界会变成什么样,包括美国利率方面的变化。

珀森最后强调说:“在西欧也好,美国也好,新兴市场也好,国内的结构改革成为一个关键因素。我们所说的社会转型,不仅仅包括技术。我觉得在中国这点尤其明显。”

本报记者 谈璿